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9
5 March 1975
CHINESE

第一八一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法西奥先生	(哥斯达黎加)
出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斯托比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肖费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625)

主席： 按照安理会第一八一三次会议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 按照安理会第一八一五、一八一六、一八一七次会议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邀请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罗马尼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塞浦路斯的局势。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 主席先生，首先我想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欢迎阁下回到联合国再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 我们仍然记得你在主持理事会一九

七四年第一次会议时所作的优异表现，当时我们两国的代表团和其他新的非常任理事国一样，都是刚刚当选为安理会的成员。我们希望你在目前的任务上获得成功，我们保证和你充分合作。

我们也希望对中国黄华大使出任理事会二月份主席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祝贺和赞赏。

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在今年的第一次发言，我也希望向安理会新的非常任理事国致简短而热诚的欢迎词。意大利、日本和瑞典的代表，带着他们国家丰富的经验和伟大的成就回到理事会。圭亚那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把年青的国家的远见和活力带到安理会，它们在实现不结盟运动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为未来的世代绘画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也向安理会各前任理事国致意；奥地利、澳大利亚、印尼、肯尼亚和秘鲁的代表，每一位都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安理会的工作作出了珍贵的贡献。能够与他们一起在安理会里服务，实在是令人感到愉快和光荣的。

我们大可以这样说：安理会开会审议任何一个具体危机是令人遗憾的，单因是危机本身的出现已经是可悲的了。安理会现在不得不开会再次审议塞浦路斯的局势，我国代表团对此尤感遗憾，因为召开这次会议就不得不缩短秘书长在我们那地区所做的访问。他只在巴格达停了一夜，原定计划是停两夜。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再有机会欢迎瓦尔德海姆先生到我们的首都作贵宾，不再因世界上发生的危机而受到压力。

我们要在这里赞扬秘书长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上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同时也要赞扬他的个人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的努力。他曾参与解决伊拉克本身的一个问题，使我们直接体验到他杰出的才能和忠于工作的态度。

正如已经有人指出，塞浦路斯的恶化局势是慢性的、复杂的，我更可以这样说，是混淆不清的。现在辩论接近尾声了，在留心地听取了所有已经发表的谈话之后，我们怀疑就塞浦路斯这个难题到底还可以说点什么，除非引起更多的相互指责，或

可能使安理会陷入长篇累赘的发言和无谓的辩论，再度染上这种联合国的流毒。

我国代表团欣赏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在这场辩论的开始讲话中所体现的明智，他说他不会揭开旧的疮疤，也不打算归咎于人，他诚挚地希望他的所作是建设性的不是阻碍性的。不过，可能是不能避免的，旧疮疤已被揭开，而我绝不想加重这种痛苦；今天的塞浦路斯已经受够苦了。

现在的塞浦路斯正处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其中一线希望就是各方面几乎都一致认为：恢复塞浦路斯土希两族代表的谈判是必须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出有关各方能够同意的各点，避免强调他们之间的歧见。二月十三日的片面宣言无疑引起大家对该岛前途深切的关心。我想在此重申：伊拉克坚决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及其不结盟的地位。

所有有关各方都已经重申他们将坚守这些基本原则，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满意。我们注意到登克塔什先生在他二月十三日的宣言中表明他的决心说：“坚决反对一切破坏塞浦路斯独立的企图，反对分裂塞浦路斯或使它与任何其他国家结合……”（S/11624,附件B,第1页）我们现在也想提到在上一届大会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外交部长都谴责任何希塞统一或者是分裂该岛的企图。我国代表团对土耳其奥尔查伊大使重新提出的保证表示欢迎，他说土耳其政府毫无走上分裂塞浦路斯之途的打算，而且事实上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的保证国，土耳其将强烈反对各方为分裂或兼并该岛而进行的任何努力。

而在另一方面，塞浦路斯的土族代表切里克先生又声明：不应把他们的提议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我相信登克塔什先生自己也曾经说过他们的宣言并不是对塞浦路斯问题预先作出最后的政治解决办法。

看起来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相信双方都要塞浦路斯继续保持一个独立、主权和不结盟的国家。双方看起来都接受在该岛建立分开的社区的必要性。似乎双方都愿意讨论国家的结构问题和各族（社区）地区的边界问题。

现在已经有各方面在向有关各国提出呼吁，为恢复谈判创立适当的气氛。

安全理事会在试图对目前的局势采取积极的行动时，起码应该做到下列各点：呼吁有关各国为执行第 3212 (XXIX) 号决议而即开始采取真诚的行动，使秘书长随时能为各方服务、呼吁此等国家与秘书长和安理会充分合作，以便对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只有这样安理会才可为迅速恢复谈判创立适当的气氛。我们诚挚地希望安理会的努力圆满成功，不会让人觉得又要耽于无益的辩论。

主席：既然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过言了，现在我想代表我的国家发言。

哥斯达黎加政府对本理事会主席的职位极为重视。它决定在轮到我国担任理事会的主席时，应该由它的外交部长来执行这项职务，由此可证实我们对这职位的重视了。因此，我才荣幸地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担任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今天会坐在主席的位子上。

我非常感激参加昨天和今天会议辩论的理事国向我表示的祝贺之意。我也非常感激所有曾经一起协商的成员对我所表示的重视。他们给我的意见对我的履行这项崇高任务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我想借此机会向理事会的新成员圭亚那、意大利、日本、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道贺，并希望和他们合作。

我们是应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代表的要求在此开会的。我们开会是为了审议一项紧迫的问题，如果不迅速解决的话，可能危及世界的和平及安全。因此，我相信，如果安理会在听取了有关各方的发言以后，仍未能及时决定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毫不含糊地表示有意协助找出一满意的解决塞浦路斯的冲突办法的话，那么安理会就是没有尽它的责任。

这场自二月二十日便开始的辩论，虽然很冗长但却很有益，使我们有听到冲突各方的清楚明了的辩解。我们听到了这场冲突的历史背景和近因。也使我们听到了理事会所有成员和睦相处而发出的重要呼吁。但是我们绝不能再延长这场

辩论了。因为当我们在此开会时，塞浦路斯两族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他们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他们之间的宿怨更为加深；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人所受的痛苦越来越大，而塞浦路斯则逐渐成为一场可怕的经济萧条的受害者。

我们必须达成结论，而根据在安理会里所说过的话，也只能有一种结论，就是实际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中的原则，安理会曾以第365(1974)号决议表示赞成使大会决议具有约束力。安理会的决议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一致通过的。这两个决议中所载的原则可以概述如下：第一，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第三，撤退一切现在驻扎该岛的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第四，使难民回返家园；第五，通过平等的谈判找出办法来解决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社区之间现存的问题，以便达成一项可以为双方自由接受的协议。

我提出这些原则虽有先后次序，但并不一定暗示着执行这些原则的时间要按照这个先后。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召开现在这项会议是因为当事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使谈判陷于破裂，所以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要确保当事各方尽快恢复谈判，能够在比过去更合适的谈判地点，并有比以前更适当的程序来进行谈判。

当然，我们知道这必须要靠塞浦路斯人自己通过谈判方式来对他们的政治问题作最后的解决。但不能说一待谈判恢复安理会的任务便完了。考虑到谈判一旦失败或破裂对该岛、东地中海区和全世界的和平就会造成危险，大家都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监督谈判的进展，并尽可能保证当事各方将能找出新的办法来得到和平解决。

帮助这项新的对话得到成功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让联合国秘书长也积极参与其事。瓦尔德海姆先生在执行他的一般职责时，特别是执行塞浦路斯和平谈判方面的职责时所表现的谨慎和干练使大家都认为他是调节和促进谈判最能干的官员，我们希望谈判会成功。

在这场辩论里，理事会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表示对秘书长参加将要举行的当事

各方的对话具有信心，对他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也有这种信心。毫无疑问现在有一项共同意见——连当事各方亦有同感——大意是应该邀请秘书长随时为谈判各方服务，从而使各方的努力取得更好的效果。

我认为这场辩论又表示出理事会的成员在其它重要问题上也有共同意见，都反应在一项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周末之前通过的决议上。首先，大家都承认，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为总统的政府是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不论为改变该岛的宪政提出什么辩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要一天没有任何宪政上的改变，只要一天没有按照新的条例选举出另一位国家元首和一个相关的内阁的话，那么现在的塞浦路斯政府，这个差不多得到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承认的政府将仍然是其国民的合法代表，同时也只有由该政府任命的人士才是该国在本组织里的惟一合法代表。

其次，大家都一清二楚地认识到理事会的成员就维持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这一点也已经有共同意见。因此，显然所有的理事会成员都反对任何分裂塞浦路斯、或希塞统一、或所谓希土两族分别与希土统一的企图。

理事会成员对宣布成立一个自治的土族塞人联邦国家这项单方面的宣言也有一项共同意见：大家都认为不可取。这个在讨论塞浦路斯将来宪政地位的谈判快要开始之前而作出的决定，自然是希族塞人无法接受的。结果谈判立即终止，我们现在所努力的就是要恢复这一谈判。

虽然我们仍然对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的宣言感到遗憾，但是平心而论，我们要指出土族塞人的特派代表切里克先生和他的领导登克塔什先生都曾经重申，这项行动没有损及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图，也没有意图对将与希族塞人一方就塞浦路斯共和国未来宪政组织问题而举行的谈判的最后结果事先即作出判断。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些声明与宣言的正式文本是完全一致的。宣言重申土族塞人坚决反对任何对塞浦路斯的独立有害、或任何导致其分裂或导致与任何外国结合的行动。宣言又重申：土族塞人的最终目标就是在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的范畴内与希族塞人社区团结在一起。

如果这些真的是土族塞人的目标，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不再作出新的单方面决定，因为象二月十三日的决定一样，会对他们所声称的最后目标构成一种障碍。

以辩论中显示出已经有共同意见的各点为基础，已经编写了两份工作文件，其中载有珍贵意见可供可能提出的决议草案之用。一份是由法国、意大利和联合王国的代表编写的；另一份是由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编写的。有了他们这些可佩的努力，我才有幸地自三月一日星期六就任主席的那一刻起，与各位进行密切协商。西欧国家集团的三个理事国和其它不结盟国家的理事国先后与自己集团的国家进行协商，也与其他理事国和有关的各方进行了协商。大家都必须感激这种努力，因为这种努力可能让我们有一项单一的决议草案，综合我提到两份文件的内容。

由于安全理事会这些积极性很高的理事国不懈的努力，我想我们很快便能够通过一项决议——我希望是一致地通过的决议——来结束这场辩论，这项决议的目的是要促进塞浦路斯两族经验丰富的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立即进行新的谈判。

我希望向谈判代表们表示我深信他们有口皆碑的才干、稳健、经验和对人民的爱护将能使他们获得谅解的条件，这种条件到时候会成为塞浦路斯两族之间和平共存和积极合作的基础。

诚然，有时候看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其他社区之间也有看来是不可和解的分歧，但终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获得解决。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

如果我们详细研究一下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在尼科西亚举行的谈判中断以前通过秘书长的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所交换的有关宪法组织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当然，由于着重点有差异使他们的建议有时候看起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进展了。大家已经同意新的塞浦路斯国应该是一个两族组成的联

邦。虽然登克塔什先生曾提议建立一个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而克莱里季斯先生则主张一个多区组成的联邦，但后者的意见其实与前者相当接近，因为他也同意北部的一大片地区将由土族塞人控制。就切里克先生来说，他在理事会中以土族塞人社区代表的身份发言时，曾明确表示登克塔什先生的提议不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为在谈判的过程中，自然会有一方提出提案对方提出对案，直到得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折衷办法为止。

我现在是指出双方同意的各点，完全没有提供如何解决基本问题的打算。我要重复一遍，建立一个新的塞浦路斯和解决有关的问题是塞浦路斯人责无旁贷的任务。不过，我不能不表示希望，如果以一种新的精神来进行谈判，瞻望将来既往不咎，塞浦路斯将能重享和平，我又希望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塞浦路斯人的国家将会兴起，现居该岛的两族间百年来的宿怨和血战永不复见。

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我现在以主席的身份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在没有开始讲话之前，请容许我对你特地从你的国家来这里主持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作审议，表示赞扬，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比我们所预期的更多时间来解决。我这样说，是因为你身为哥斯达黎加的外交部长，你在国内一定有很多任务。但是，你认为应尽一份力量，寻求途径和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作为一个领袖的责任感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你的国家是一个小国家，更应加以赞扬，小国家的代表们比以前更积极参预这方面的事务，使我们非常感动。我希望大国看到我们许多小国关怀联合国事务时，不会看不清这一事实的意义。

在我已经参加的辩论的整个过程中，一方面我看到我们的希腊和土耳其同事之间，另一方面我看到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代表之间呈现了真正的和谐，令我非常感动。虽然我们听到一些不重要的谴责和反驳，我认为有关方面都能友善地对待对方。如果我没有感觉到，我就不会这么说。虽然流了血，并且塞浦路斯的一般人民——我用“一般”这个字并没有贬损的意思——不管是希族或土族的塞浦路斯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并没有深刻的痛恨，或是仇恨的阴影。

主席先生，贵国的大使一定已告诉你我在安全理事会已经就这个问题发了言。为什么我又再度要求发言？我提到塞浦路斯正好在我们的地区内。我很高兴我的伊拉克兄弟和同事今天也发了言，因为塞浦路斯是中东的一部分。我们都很关怀。中东的所有国家都关心在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塞浦路斯是哪些看不见的势力争夺的小天地也是，请容许我用这个说法，拔河比赛的缩影，可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但是我们都感觉到了。我不想引证事实来令我的一些同事难堪。我可以引证事实，但是如果我这样作，我就会引起别人使用答辩权，然后我又必须答复必须指控。结果会怎么样？这种结果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它将导致更多的仇恨。我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我是经历过痛苦的经验才学到这个道理的。既然阿拉伯各国有些过剩的石油，那么现在我巴鲁迪是不是要借此在混水上泼点油呢？不，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在这些石油上点火，那么我们就徒劳无益了。火会烧

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这个譬喻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有道理的。

我为什么又再度发言？在上次会议中，我向我的印度好兄弟和同事，他是坐在谢夫琴科先生后面的秘书处的一个成员作信号，表示我要发言。他以为我的信号是表示我要见他个人，所以我丧失了讲话的机会，在我听完了各发言人的讲话之后，我发现他们虽然诚实敏锐，并且思路清楚，但是由于没有工作文件，他们讲话总是绕圈圈。至少，如果有工作文件，可能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不给我看它的内容，也可能他们还没有达成协议。

我感到很难过——不是为坐在会议桌周围的各位先生，而是为正在受苦受难的塞浦路斯人，不管他们所谓的宗教或民族背景是什么。他们都是塞浦路斯人，我们很久就决定这一点了，我们反对希、塞统一，反对分治。这就是塞浦路斯存在被宣布为联合国一个独立会员国的理由。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桑普森这个人物作了一些调查，我听说他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我说，“好家伙”因为我一直都对我们的哪些英国朋友有怀疑，我认为自劳工党掌权以来，他们已经不做许多在殖民时代曾经做过的事了，自拉姆齐麦克唐纳开始，在一九二四年事情有较好的转变。你们记得那一年吗？

我听说桑普森是一个狂妄的人，是一个冒险家。我不是要问克莱里季斯先生也不是要问我的好朋友奥尔查伊大使这是不是真的，因为这可能使他们感到难堪。你们知道桑普森作了什么事？在塞浦路斯解放斗争中，他砍了英国军队的头——不是希腊或土耳其军队的头。

我真羡慕我们的英国朋友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和沉默，即使在桑普森砍掉他们在岛上的同胞的头，他们也从来不控诉。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英国士兵被吊死在巴勒斯坦的橄榄树枝上，我们的英国朋友也没有太多的控诉。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没有人能象英国政府那样毫不激动的。偏巧我们是地中海人民，但我右边的好兄弟和我对面的好兄弟的行为竟然多少象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冷静。这很令人高兴，因为从地中海人不动情绪处理问题的新态度，我看到了希望，虽然

土耳其和希腊人及土族和希族塞人之间的情绪可能很高昂——因为他们是人。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阿拉伯人。一九三〇年代在巴黎，有一次当我到康科特官去的时候，我被挤入一群群众，我并不知道是什么示威。我大嚷大叫，但是并不知道叫些什么，直到机关枪开火。我不想再谈这件事的细节，但是大家都记得这是史塔夫斯基案件。这是一九三〇年代的事。我用阿拉伯话对自己说：“杰米，你在这里干什么？赶快离开这里。”——为了不要和纳粹党人搞在一起。有一次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法国人。他说，“啊，你应该念念古斯塔夫·黎朋的《群众心理学》。”这就成了一句名言。

我们对塞浦路斯人应该有什么期望，不管他们是土耳其人或是希腊人——请让我加一句，“还有其他民族”，因为不是所有的塞浦路斯人都是希腊人或土耳其人。有些人是来自阿拉伯世界。他们都是塞浦路斯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利益就是塞浦路斯的利益。几天前我提到他们之中有些是来自黎巴嫩的马尼教徒。其他一部分人是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或回教徒。有关塞浦路斯的事可以问我。它是我所在的区域。

但是人还是人，我不想将他们分门别类。一个民族是由其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来决定的，而不一定由宗教来决定，这点我们在几天以前已经有了定论。因为如果是由宗教来决定，我们就不应看到欧洲的基督徒从事两次世界大战——星期天以和平之王耶稣的名祈祷，翌日就自相残杀。所以宗教根本不相干。有些人也许在脑筋里有宗教意识。以我的家庭巴鲁迪家族为例。我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古老并不是一种荣誉，你的脑筋必须经常保持明亮，当你太老的时候，你的脑筋就会生锈。巴鲁迪家族有一半是基督教徒，一半是回教徒。我们并不说，“你是一个回教徒”或“你是一个基督教徒”

这就是我对塞浦路斯的同事所提的建议：请不要把宗教当成你们争端的重点，因为由此可能产生一切困扰，并且甚至可能使其恶化。请看看地中海那一块狭长地方另一边的黎巴嫩。黎巴嫩有各种派别的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尽管你在这个国家（美国）看到有关虐待犹太人的种种宣传，在黎巴嫩还有犹太人过着和平的生活。

他们是具有充分地位的公民，人民非常健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方式而不以宗教为争端。我并不是说塞浦路斯的情况是和黎巴嫩一样的，但是是相似的。

我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来这里说教？如果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办，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到底巴鲁迪是何等样人？为什么应该由他来管？叫他少管闲事吧。阿拉伯人已经有够多的麻烦了，在他们来给别人劝告之前，叫他们先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吧。

但是到底我是联合国的一个代表，我与这个组织站在一起。我这样作已经三十年了，并且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赞扬我们的主席，一个来自远离纠纷中心7,000或8,000哩的哥斯达黎加人，他参与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应该尝试什么办法——如果这些办法还没有试过毫无疑问，有些办法已经试过只是我们，包括我自己，不知道而已。让我坦率地说，我决不含糊。我并不想令任何人难堪，所以请你们之中的某些人不要感到不舒服——如果你认为某些批评是指你的话，那就不能怪我。有一句阿拉伯格言说：“如果你把一支马鞍针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它就会刺痛你的腋窝。”我们不知道谁的里袋内有针。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对一个外交部长提到这个格言，他问我“堕落的民主国家”是指谁，他的国家有没有包括在内。我就提到这个格言——“如果你把一支马鞍针放在里面的口袋，它就会刺痛你的腋窝。”——他就把手伸进他的上衣并且说：“我并没有马鞍针。”我回答说：“在另一个口袋找一找，也许你会找到。”那是远在一九四七年在成功湖的事了。

我们之中很多人都藏有这种针。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用这种办法。我将开始谈谈希腊和土耳其及地中海人民。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新世界的文明也是它的延伸，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求助于这些有光荣历史的人民。我自己生来是一个奥托曼臣民，几天以前我提到土耳其人如何宽容。谁能够否认希腊人

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阿拉伯人是许多希腊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者，我们以此为荣。的确，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就没有人会知道亚里斯多德或柏拉图。我们应该将我们自己当作具有共同利益的一个地中海共同体。宗教或政治派别都不应让我们陷于分崩离析。

但是我更以为：我们应该将我们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共同体。当然，这是乌托邦的想法：我们人类社会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因此，我抓抓我的秃头，想想作为来自这个区域的人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到许多办法，其中有些也许比其他办法更值得注意和考虑。

我将先谈谈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请注意，如果我说“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是因为我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讲的。让我们暂时忘记上次我跟你们讲的历史背景，因为我可能只是重复我已经讲过的话。许多希腊人在奥托曼帝国有特别的建树。土耳其人统治希腊人直到一八二四年左右希腊独立为止——你们记得英国人派遣拜伦勋爵去煽动希腊人——由于土耳其人的宽容，希腊人并没有因宗教信仰而受苦。为什么？因为土耳其人是很虔诚的好回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是圣经的子民，而今日安纳托利亚的人民，我认为，也许和大部分的沙特阿拉伯人民一样是虔诚的回教徒，他们并不痛恨基督教徒，除非他们受政治的刺激。同样，许多希腊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知道：他们比西方同教的人更能遵守他们的教义，西方信仰同一宗教者如我所说的，借宗教的名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彼此互相残杀。

现在只有一个人，我们的朋友马立克大使感到很安适，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宗教问题：他们是无神论者。就可兰经上说：“宗教是没有强迫的，”以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接受你的无神论。我们不能强迫你作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或虔诚的回教徒，所以你原来是什么就做什么吧。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没有宗教问题——除非有些人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宗教。不需要提他们你们知道是谁。

所以，最重要的原则——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不要在塞浦路斯或其他地方煽动宗教仇恨。我们这个部分的世界是经不起这样作的。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管他们在新闻机构怎么说我们的伊拉克朋友，这些新闻机构是受某部分人控制的，是哪部分人我不用说。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尽力让希族和土族塞人冷静，并且告诉他们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令人难过，令人悲伤的，不应该由于宗教上的不能容忍再发生这种事。

现在，已经谈完问题的背景，让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办法。因为它牵涉到某些国家——我不须要说出它们的名字——的特别利益，这个办法也许不实际。在此我只是对我们的希腊和土耳其兄弟说的。他们两国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不是吗？有没有任何一国撤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了？当然可能有国家会，我不知道。当有关双方之间的任何仲裁建议，都可能触犯一方或另一方时，试问这是一种什么联盟呢？我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盟，是行不通的。

我自己并不相信军事联盟。我希望我们阿拉伯国家将来不会被迫组织一个军事联盟。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应该安安静静地设法调停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歧见。毕竟这个组织有我们英国朋友的睿智、法国朋友的敏锐和逻辑，及意大利朋友地中海人的感情。意大利人是感情丰富的民族，他们是亲切而多情的。以前有人对我说：“意大利人不是好士兵，你看看他们。”我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比你更文明，他们比较喜欢唱歌和歌剧。”毕竟文艺复兴是自意大利开始的，这是他们的光荣。人仍然是野蛮的。他们认为暴力，互相残杀在战争或和平时都是一种德行。

我已经提到三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有其他的。我并不想排除东德意志和西德意志不谈，它们把德意志分成两部分，这是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当然，这不是我的事。

如我已经说过的，第一个办法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安安静静地设法调停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歧见。很不幸，事件仍是随着老路子发展：我们的希

希腊朋友支持希族塞人，而我们的土耳其朋友支持土族塞人。这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最重要的原则是希腊和土耳其的统治者要有宗教宽容的精神。在这个会议厅中我们看到这个证明。

当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的尝试可能失败。如果它们失败，我们必须提出另外的选择或办法——随你称选择或称办法。

凑巧塞浦路斯被认为是所谓第三世界，或不结盟世界的一员。我说“所谓”因为我不相信这类没有实质的名词。这些都是陈腔滥调。沙特阿拉伯也被认为是属于第三世界，不结盟的世界。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世界，而这个组织就是它的媒介。虽然尊重第三世界成员，包括我的国家，所抱的目标，我要问：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之间有没有任何共同点。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家都为各种特别利益而努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有各国的利益。如果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是一个坚固的集团。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它是非常脆弱的。我不知道华沙公约怎么样；我希望它不是非常坚固，因为如果是非常坚固，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一直存在。

适当的处理方法是讨论问题，探讨问题的根源，坦率地面谈，而不是仅仅宣读声明。我们所听到的话措辞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设法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明白这些都是陈腔滥调。——漂亮的陈腔滥调，但是仍然是陈腔滥调。有时候我希望讲话要付税，行动有奖赏。有一句阿拉伯格言说：“让他说吧，反正他讲什么都不要付税。”由于嬉弄文字和双重意义及文饰狡辩，我们之中大多数人常常口是心非。我已经一再说我希望我们象小鸟一样吱吱喳喳讲话，而不要把不同的意义加在语言上面。我要提到有名的第242(1967)号决议，作为我所说的一个例子。在当时我告诉安理会这个决议将弄巧成拙。因为没有在“最近冲突所占领之领土”这些字之前加上“该”字，所以每一个人都给这个词句加以不同的解释。正如哈姆雷特对波罗尼奥斯所说的：空话，空话，空话。如果波罗尼奥斯今天仍然活着，他会仍然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要依赖言词、决议或工作文件呢？

如果第三世界和／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能够安静地在一起举行法国人所说的商谈，交换意见，也许恐惧会减少并且能够解决一些事情。我不知道，这些都是可行的办法。我们正在探讨各种方法和途径。

我们不应该排除我们的好朋友马立克大使所提出来的想法。他有权提出他的看法。他说：“为什么不让安理会的五个理事国一起开个会？”当然他指的是大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不想用“超级大国”这个字眼，因为我不想伤害你，马立克大使，我也不想谈到你和你所知道是谁的吵架。为什么不探讨开会的可能性，根据“反对希塞统一，反对分治，”一贯的原则寻求调停歧见的途径，同时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成员国中选出几个，三个或四个，一起开会。克莱里季斯先生，你听到没有？一九五八年使我开始谈“反对希塞统一，反对分治”这个主题的就是你。

我并不想让我们可敬的秘书长一个人担负所有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如果需要他服务的话，他可以作为有关方面的中间人，不仅是直接有关的方面，而且是那些与这个局势有关的各方面之间的中间人。

不要认为我没有记下其他的选择。但是理事会已经开了好几天的会，还没有弄出任何办法，虽然我尊重你们都是你们国家非常能干的代表，可是你们只是绕圈圈。我不是理事会的成员，因此我谢谢你们允许我表示我的意见。我没有投票权，谢天谢地，我不是安理会的成员，不须要投票。但是这并不妨碍参加联合国，而认为这个组织是无可取代哪些非安理会成员的国家，在此就如何打开这个僵局发表粗浅的意见。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稍微谈谈有关当我年轻时在西方世界在伦敦和巴黎——不是从在东方的书本上——学来的经济学和财政方面的知识。我没有未卜先知的“水晶球”，我不象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没有从他们的水晶球看到任何东西，但却想象他们看到了什么。

凑巧，我们将有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是共产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它是一个混合物，既非鱼，也非鸟。我不知道将来我们能不能认出这种“动物”，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走向什么样的经济窄路。

如果大国都破产了——我真的是这个意思——它们已经将它们资源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战争中——如果它们的货币贬值到根本没有价值，中产阶级也消除了，如果卢布也贬值的话，有一天赞成技术专家政治家也会给消除，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人民的经济不会遭遇困难，如果它们的经济和财政不断地消耗。你们现在也许已经是半破产了。我不想说出已经破产者的名字。它们现在都已经破产了——沙特阿拉伯也是，虽然它有剩余，因为当我们卖石油时，我们得到的是正在贬值、没有价值的、不能兑换的纸币。

让塞浦路斯、希腊或土耳其继续这个冲突，使它们更为贫穷，到底有什么益处？是谁获益？当然，你们的统治者将有益处，统治者总是有办法吃饭并且找到工作。但是人民怎么样呢？你要他们造你的反，造你们统治者的反吗？

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东道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就在昨天我们读到有二百万件武器在纽约市民手中。此地如果发生一个危机，而政府不能采取坚决的措施，你想人民会象一九三〇年代一样拿着汤碗到时报广场，并在街上卖苹果吗？他们将起来造反。所以，如果连这个充满资源的伟大国家，人民都会因为经济情况而动乱不安，那么你们——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算老几？你们将会破产。人民将起来反抗你们。他们要吃饭。把你们的资源用在什么事情上——用在纷争、战争和冲突上？人民不会让你们这样作的。如果我是这些人民之一——即使我看到一只蚂蚁我不会践踏它——我也要造反。他们将造你们所有人的反，不管你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起源或个别的政府是什么。

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讲的最后一句话：现在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和财政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你们认为它会对任何人有好处吗？我相信如果我们的苏联和中国朋友——我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讲话的——看到悲惨的情形，他们将不会举行宴会，

因为他们是人。 毕竟人道主义高过意识形态。 尽管肤色不同，我们还是兄弟，不管我们的政治信条是什么，贫穷的人应该是我们同情的对象。 我们在这里年年都谈“人权”，但是却看着人民由于缺乏食物，或由于缺乏购买维持生命的必要食物的财物而受苦——我不是在讲人民由于战争而受苦，战争简直是疯狂——难道我们是伪君子吗？不要让你们的人民因为贫穷而造你们的反。

让我再回到我的最后的话题。 我恳求你们双方在寻求解决方法时不要太僵硬。不要被“联邦”“同盟”，“自治”和“分治”等这类名词所迷惑。 要抓住问题。忘掉宗教不宽容的阴影，想想人道主义。 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阿拉伯人，都应该坚持这个信条。 不要认为我只对你宣讲这个信条，我也向我自己的同胞宣讲这个信条。

我焦虑地等待看到你们商讨出来的一些办法，我将非常关切这些讨论，希望能产生一些结果。 如果安理会成员国同意，我要请求你们宽容我，让我视你们讨论中所产生的是明显的还是暗中的办法而定，再向理事会发言。

主席：现在没有安理会的理事国登记要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切里克先生已经要求允许他再发言一次。 根据安理会在二八一三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切里克先生：主席先生，谢谢你并通过你谢谢理事会每个成员给予我发言的机会。我认为必须要求作第三次发言以便对克莱里季斯先生昨天在安全理事会的陈述中所提出的几点意见有所评论。

我无意同克莱里季斯先生进行没有结果的对话，但是我觉得必须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所申论以便澄清土族塞人的立场。

他在昨天的陈述中，克莱里季斯先生一开始便归咎土耳其没有撤退其在塞浦路斯岛上的部队，因而未曾实施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并暗示那便是希族塞人方面再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因。

关于此事，克莱里季斯先生在昨天和以前各次的说明中曾向我和土耳其奥尔查伊大使提出关于实施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许多具体问题。那些问题有时是以挑衅的方式提出的。

我希望希族塞人方面知道，利用整个纽约，特别是这个会议厅作为宣传之用的鸣放所在决不是获得这些问题的正确答复的适当途径。所有这些问题的答复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得到。

如果希腊方面宁愿继续进行谈判而没有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来到纽约，则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可能现在已经获得答复了。我再次最至诚地促请克莱里季斯先生回到谈判桌去并尽早恢复与登克塔什先生的谈判。

我要在此重复已经载入记录的话：实施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不只是指撤退塞浦路斯岛上的土耳其部队。这个决议必须整个地加以处理和实施。土耳其方面已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过去各种场合将土耳其部队撤出塞浦路斯的条件清楚说明并将之列入记录。我们曾说过，鉴于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数较少和军力弱得多，近十二年来一直是塞浦路斯吃亏的一方——遭受安全上的危险，撤退部队问题和难民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应该和必须在最后政治解决的范畴内得到解决。

首先必须有开于宪法问题的一项协议然后才能解决安全问题，解散和遣散塞

浦路斯希腊族的军队和武装份子以及为完全的正常化，包括部队的撤退在内，铺平道路。

唯有这样，才能充分实施第3212 (XXIX) 号决议而所有有关方面愈早认识这点和我们愈早回到谈判桌去并恢复谈判以解决政治问题，第3212 (XXIX) 号决议才能愈早实施。

克莱里季斯先生向安全理事会控诉说土耳其军队侵入“他的国家”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百分之四十——当然是指希族塞人的土地，因为他只能象他实际上所说那样为希族塞人一方说话。但是，塞浦路斯是我们的国家；它是土族塞人的国家如同是希族塞人的国家一样，前者实际上据有该岛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土地。被侵入的土地便是这块土地，为的是要阻止或终止已因七月十五日武装政变而完成的一个实际的希塞统一运动以及挽救该岛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不结盟。侵入该岛“为的是要使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免于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遭受政治、行政、社会和经济的歧视篡夺、干扰、驱逐和/或消灭”。

这便是必须解决的反常事态。这些行动和不公平待遇必须首先加以制止。希塞统一运动和斗争必须先放弃。当这些事情做到后，克莱里季斯先生便可相信而放心土耳其部队一方自将撤离该岛。

至于包括希土两地区的办法，实在是土族塞人为了显然的安全理由所作的实际重新组合，如我以前在理事会发言时所说的，这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迫使我们这样做的，它除了自己，没有他人可以责怪。

克莱里季斯先生说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的政策是基于分治而不是基于独立，那是错误的。土耳其方面从来没有把分治看作独立的一种代替品。它一直被视为对希塞统一运动的一种解毒剂；事实上，分治便是塞岛两族分别与希土统一。

几年来，希腊方面曾试图通过自决达到希塞统一。

因为塞浦路斯现有两个民族的社区，所以并没有塞浦路斯民族，在我们争取平等的斗争中，我们总是要求说，如果实施自决权利，那么这种权利便应同样适

用于两个社区，就是说两个社区都有权选择塞浦路斯分别与土耳其和希腊两个祖国合并，所以便是塞岛两族分别与希土统一。

只有在希塞统一运动高张或将要得逞的时候，土耳其方面才想到分治一事。分治不是取代独立而是对抗希塞统一运动的。

克莱里季斯先生为了竭力指责土耳其方面已采取一项分治政策，在他昨天对理事会的演词中宣读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每日新闻《人民呼声报》一篇新近报导的摘要。如果我们引述关于希塞统一的塞浦路斯希腊族的新闻报道，我们将花费若不是几年便要几个月的时光来做这件事。但是为什么要从新闻报道中来引述这事呢？为什么不引述官方人士、负责人士所作的正式声明呢？这便是克莱里季斯先生的唯一弱点。这是他的脆弱之处；现在没有他能够引述的许多声明。另一方面，塞浦路斯希腊族方面关于希塞统一的立场是怎样呢？我们有一个塞浦路斯希腊族，它的总统、领导人、机关和人民所想的是希塞统一、所要的是希塞统一、所说所写的是希塞统一，他们为了希塞统一不但同我们土族塞人作战并且彼此斗争。

我不相信广泛引述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就希塞统一所作的说明有什么益处，而且我全然无意于因这件事花费理事会许多时间。所以，我认为只需引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这里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代表团每一成员和其他政治领导人所发表的一段或两段演词便够了。

首先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发表的声明：

“我现在能够宣布说，我曾时时明白而肯定地向希腊政府说过，如果在希塞统一方面我能得到同意，即如果希腊已准备接受希塞统一并愿承担此事所引起种种影响的责任，则我将毫不犹豫地宣布希塞统一。”

其次是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马卡里奥斯在复活节的庆祝会上对塞浦路斯的希腊军特遣队成员所作的讲话：

“我们希族塞人从你们的身上看见了希腊的存在。我们希族塞人现在仍然怀

着复活周的‘伟大星期五’的悲哀。但是我们不可动摇信心是我们的民族将在受难之后复兴。来自圣墓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艰苦的民族之路。我们将同希腊人一样向前迈进。我们的罗盘针总是指向不朽的希腊——我们不朽的祖国。我们道路的尽头便是古希腊都城的卫城。这卫城是我们的企望和美梦的象征。”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马卡里奥斯在荷兰和比利时电视访问中所作的另一项说明：

“希塞统一是我们所有希族塞人的民族愿望。这个愿望将永远不灭。由于非我们所能控制的某些困难这个愿望现在不能实现，那是另一回事。”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希族塞人政府前外交部长凯普里阿诺先生在圣菲拉克斯林所作的一项说明：

“说出所有人民愿望的国家领导方面现在不准备接受冒充民族复兴的任何折衷解决办法。塞浦路斯人民要整个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民将继续斗争，把希腊的旗帜、希腊的德行和希腊的理想当作他们的标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凯普里阿诺先生在与贝鲁特每日星报编辑的谈话中作了如下的谈话：

“编者：有人报道说贵国政府现愿意接受在塞浦路斯岛上建立一个北约组织的基地以换取希塞统一。这是真的吗？”

“凯普里阿诺：希腊是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设若希塞统一，塞浦路斯自当成为希腊的一部分，对于北约组织来说它与希腊的其他部分一样。因此，一个北约组织基地的问题便应参照这一现实来加以审度。”

“编者：有人说贵国政府在目前这个时期并不积极支持希塞统一运动。这是真的吗？贵国政府现仍保证与希腊合并吗？”

“凯普里阿诺：塞浦路斯政府一直保证按照塞浦路斯大多数人民行使他们自决权利后表示的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大家所知道，塞浦路斯极大多数人民希望与希腊合并。”

我刚才引述的各项声明是声称致力于不结盟政策和现仍假装对之服膺的一个

政府的总统和外交部长所分别说的话。

下面是前劳工部长现为塞浦路斯希腊族代表团成员的塔索斯·帕帕多波洛斯先生的一项说明：

“我们的传统和祖先的业绩已预先划定了我们历史进化的途径而任何力量、任何压力、任何威胁、任何干预、任何牺牲和任何时间都不能改变我们历史自然进化的途径，这种途径导致自由和同希腊的合并…塞浦路斯人要相信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是在历史上是必要的，现在正是时候了…塞浦路斯如在希腊版图之外便无自由可言。”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希族塞人的塞浦路斯全国民主党领导人莱萨里德斯博士在凯普罗斯所作的一项声明：

“塞浦路斯全国民主党相信解决塞浦路斯的办法如果不是依据塞浦路斯人民行使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便不能持久。塞浦路斯人民自决权利的行使可以造成整个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莱萨里德斯博士所作的第二次声明：

“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塞浦路斯人民未被允许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因此，各个集团便转向不同的目标，从而便发生了危机。有些人在谈‘希塞统一主义者’和‘反对希塞统一主义者’。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设若能为希塞统一运动的完成创造适当的条件则所有的希族塞人都是‘希塞统一主义者’而且他们都准备为希塞统一而战斗并作出种种牺牲。”

下面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秘书长伊齐基亚斯·帕帕伊翁诺先生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所说的话：

“指称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反对希塞统一的种种说法都是与事实不符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支持真正的没有附带或交换条件的希塞统一作为终极的目标…”。

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日克莱里季斯先生在托利村所作的一项讲话：

“民族的义务使得我们有责任积极工作来保持塞浦路斯岛的希腊主义的民族特性，加强我们人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培养他们对希腊基督文明高超德行的信念。我们的眼睛必须常常看向永恒的希腊，因为它是人类最高理想的一种象征和一个泉源。”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克莱里季斯先生所作的第二次声明：

“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此，我们的祖国政府对于处理这个问题的种种方法和我们现阶段所能作出努力的程度应有一种决定性的意见。”

但是为什么要引述个人的说明呢？克莱里季斯先生在过去担任和现在仍然担任其主席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众议院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一致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众议院在解释塞浦路斯希腊人长时期的企望时宣称尽管环境不利，但它不愿终止在所有希腊人支援下所进行的斗争，一直到这个斗争由于整个和完整的塞浦路斯同祖国合并且无任何中间阶段而胜利结束时为止。”

塞浦路斯希腊族众议院的这个决议现仍有效而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发生的事项证实希族塞人——总统、领导方面和人民——都没有放弃他们把这个“整个的和完整的”岛同希腊合并的政策。

曾宣誓实施这个决议的众议院的希腊议员们也就是效忠和支持为了实现希塞合并而进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军事政变的桑普森的议员们。

今天在这里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假装是塞浦路斯独立和不结盟的热心支持者。他们指责我们采取一种分治主义的政策以及支解塞浦路斯。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是很清楚的。我们反对希塞统一同时我们反对分治。

至于包括希土两地区的办法——塞浦路斯希腊族方面认为这是“支解塞岛”，这只不过是对塞岛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不结盟以及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安全和生存的真正具体保证而已。

希腊方面反对由两个地区组成联邦并不是因为这个联邦将破坏塞岛的独立而是因为如从上述各引语中可以看出来的那样，塞浦路斯不再能“整个的和完整的”同希腊合并了。事实上，甚至连塞浦路斯的一部份，希腊都不能加以兼并的。这才是使他们不安的主要原因。

克莱里季斯先生再次重申前言说副总统、土耳其族的部长们和众议院的土耳其族议员们都已自动地各自离开了政府和众议院并居然说众议院中的土耳其席位现仍空着等待土耳其族议员补实。

主席先生，我要问克莱里季斯先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塞浦路斯自从一九六四年以来没有参加过欧洲议员协进会的讨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前，塞浦路斯通过我们宪法所规定的由希族塞人代表和土族塞人代表组成的一个联合议会委员会参加了欧洲议员协进会的讨论。

一九六四年间，克莱里季斯先生曾企图参加上述协进会的讨论而不要土族塞人代表出席，当协进会告诉他说塞浦路斯议会委员会必须由希土两族的代表组成时他宁可完全不参加这个协进会的讨论亦不愿意同土耳其族代表一同出席此一会议，尽管土耳其族代表表示随时准备按照上述规定赴会。今天，塞浦路斯依然没有派遣代表参加欧洲议员协进会。我觉得这足以驳斥克莱里季斯先生所说的那些话了。

至于一九六四年之后不久土族塞人便在所谓的政府控制下的共和国整个领土中享有充分移动自由的论点，我只能说这个说法并不反映真情。如果土族塞人享有充分的移动自由，为什么不准6,000名土族塞人返回他们在尼科西亚郊外的库楚克卡马克里（奥莫尔菲塔）的家园？为什么不准数以万计的其他土族塞人难民回到他们的村庄，如圣西奥多罗斯、曼苏拉和弗罗伊沙等？这里仅列举了其他数十村庄中的三个村庄。为什么连那些不幸的土族塞人难民都不准他们为了农事去探视他们的村庄？数以百计冒死离开土耳其围地的土族塞人失踪了而且也没有回来，试问是什么样的移动自由？

希族塞人获准进入土耳其控制的地区，以便从事正当的事情，没有人能举述一个例子说在土族塞人控制的地区中的希族塞人曾遭伤害。

不错，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安全预防措施以对付突击和希腊的军事渗透。顾名思义，土耳其的围地是我们最后的防卫据点，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对希腊人开放而让他们倾巢而出用武装力量破坏围地。我们甚至同意将著名的凯里尼亚公路开放给希族塞人使用，条件是凡使用者应受土族塞人的管制如同我们进入希族塞人控制的地区须受他们的管制一样，但是希族塞人竟拒不接受。作为希族塞人谈判者的克莱里季斯先生坚持说我们应将公路开放给希族塞人使用而同时接受希族塞人的管制，这是要我们作政治投降。

克莱里季斯先生曾尽力指控土族塞人方面用宣布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来造成既成事实，从而已使社区间的谈判陷于停顿。

因既成事实才发生了塞浦路斯问题，从而开始了谈判，虽有既成事实，而谈判却还继续进行，这是希腊方面造成的既成事实，这是破坏宪法的既成事实，建立秘密军队的既成事实，将希腊军队全面引进塞浦路斯以便废止塞浦路斯真正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并使它与希腊合并的既成事实。还有其他许多既成事实在此我不想列举。

可是不管所有这些既成事实，我们却继续谈判而从来没有奔往纽约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尽管马卡里奥斯发表声明说他不接受联邦国家、他不接受多州制的解决办法，他甚至不给我们地方自治，但是我们继续了谈判。他只容许我们某种程度的自治。这里便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的塞浦路斯邮报上所说的话。

“我们不接受联邦或州郡或地方自治。如果土耳其人坚持他们轻率的要求，那么谈判便是浪费时间，他们终将失败。

“如果谈判失败，土耳其人便应知道我们将撤回迄今对他们所作有着重大让步的一切提议。希腊的希腊精神准备面对一切后果。”

我们并未放弃谈判，尽管作为希族塞人方面谈判者的克莱里季斯先生甚至作了下述的挑衅声明：

“凭着普通常识，格里瓦斯将军便应得到结论，即进行了五年谈判而没有获得一种解决办法的意思是说希族塞人方面参加谈判并不是为了要获得‘任何解决办法’或对一种‘不合于国家利益的’解决办法作出不可容忍的让步，他们在谈判时所作争论目的在于维护具有真实意义的国家利益。”

克莱里季斯先生声明中的这段引语亦就答复了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谈判没有进展呢？”理由是很明显的。每个人都要一种合乎国家利益的解决办法——我们知道对希腊人来说一种合乎国家利益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但是却假装在和我们谈判独立问题。因此，有效阻止希塞统一运动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是希腊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同样，现在显而易见希腊方面不会接受给予土耳其族平等地位和不将其降为塞浦路斯岛上简单少数的解决办法。

克莱里季斯先生指责土耳其方面不准对片面宣布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一事表示谴责、惋惜甚或遗憾。我们则认为应该对造成现时僵局的所有方面的一切片面行动一律表示遗憾。

克莱里季斯先生坚决要求指派一个调查团前往塞浦路斯视察并确定谁应对塞浦路斯的情势负责。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谁应对塞浦路斯危机负责。塞浦路斯问题始于一九六三年对塞浦路斯土耳其社区的疯狂进攻，为的是要把该岛与希腊合并。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侵犯了土族塞人的一切宪法权利。土耳其族不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并且被剥夺了经济和行政权利，甚至人权。我们得不到饮水；我们得不到电力；我们拿不到出生证书；我们领不到护照；我们被剥夺了生活和生存的权利。

只举一例，象希腊人莫迪诺斯先生这类人他们与塞浦路斯毫无关系却取得了塞浦路斯公民权和护照并受雇于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但是在塞浦路斯生长的一

些年青土族塞人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七年的危机期间因没有护照而流落在土耳其，他们有十年，整整十年，领不到返回塞浦路斯的旅行证件。

我记得曾就此事为登克塔斯先生写信给克莱里季斯先生，至少有六次之多，但均不得要领。

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使用其所谓的警察力量，目的不是保护土族塞人而是压制和消灭土族塞人。被迫背井离乡的数以万计的土族塞人难民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才获准返回他们的农村。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的政变是把塞浦路斯交给希腊的一连串事件中的最后一次事件。甚至土耳其的军事干预亦未能阻止对整个土族塞人村庄人民的大屠杀。在阿特利拉（阿洛达）、穆拉塔加（马拉萨）和桑达拉（桑达拉里斯）联塞部队和外国新闻记者曾目睹数十具尸体被发掘出来，这只是三个例子而已，塔斯肯特暂且不提那里的坟墓还未发掘。

全世界都知道这事。联合国的记录大声疾呼支持我们的论点。此外，联塞部队和红十字会现正在塞浦路斯积极工作。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调查团呢？希族塞人方面为了政治理由而需要这个调查团，把它当作走向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第一步。

这是我们反对指派调查团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事情不可告人而是因为希族塞人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将会利用整个事情。

说完了所有这些话——我要告诉理事会各位理事，我并不以发表言论为乐——我要把土族塞人方面赞成谈判一事再次列入记录。我们相信两族间的谈判是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上策和唯一途径。所以，我要向克莱里季斯先生再次伸出友谊之手并向他保证土耳其方面愿意并准备与希族塞人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崭新的、幸福的和繁荣的塞浦路斯。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不要有片刻时间以为我喜欢与土族塞人切里克先生互相控诉。最使我伤心的不是互诉而是事实的真相，而比那些事实甚至更使人伤心的是眼看它们被人歪曲来制造他那一方所想要的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访问塞浦路斯，从而找出事实的真相来。

我愿意说，假如我早知道有些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把我当做他们的仇敌看待，那我也许能大大地利用他们，因为上次选举时我所面对的问题之一便是被人指责我赞成独立，反对希塞统一。我一再地受到那些只代表塞浦路斯百分之五人口的极右翼新闻界的批评，而他们唯一能批评我的事情便是我致力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及不结盟。

为了要证明希族塞人或甚至土族塞人都反对独立，而断章引用希族塞人或土族塞人的各个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所作发言的有关部分，是徒然无益的事。事实摆在面前，独立来到了塞浦路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都很勉强地接受了独立。塞浦路斯被称做“勉强的共和之国”，因为两族塞人都千方百计，要把塞岛与他们各自的祖国统一起来。这是现实，而这个现实决不能因为引用了几句话、和互相指控就改变过来。这个辩论的重要地方是把切里克先生的发言记录下来。我注意到他开始发言的准确时间，正好是下午五点四十分。他的发言真使安全理事会开了一次眼界。切里克先生对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解说应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而安全理事会义不容辞要加以审查并加以回答的也应当是这个事实。

当我昨天发言时，我以为我了解了土耳其对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所采取的立场。我在那时说，土耳其声称要执行这个决议，特别是在执行部分中促请土耳其把它的部队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允许二十万希族塞人难民返回他们的家乡的各段，就要同时找寻一个解决办法，或要参照这个解决办法来实施。我以为那就是土耳其的立场。

我今天惊异地听到切里克先生明白地表示即使那个说法也不是正确的土耳其对决

议的解释。土耳其方坚持，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不仅必须找到，而且必须在土耳其部队撤离塞浦路斯或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之前，签好字，盖好章。

但他还更进一步，走近土耳其外交部长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清砷而明确地表示的立场——即土耳其部队只有当土耳其相信除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外，还创造了使土耳其部队能够撤离的条件后，才会撤离塞浦路斯。

于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立场：土耳其是唯一能决定它何时要把它的部队从塞浦路斯撤出的人。这种声明竟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表，使我很感惊讶。我一直相信普通的用语，在任何语言中——例如英文，因为决议是用英文写的——都具有普通的意义。而我一直相信“迅速撤出”的用语意味着在合理的时间内撤出：也许数周，也许两月。但现在有人告诉我，那个要土耳其部队从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中“迅速撤出”的决议——也就是那个要为200,000希族塞人返回家园事采取“紧急措施”的决议——要被解释为在塞浦路斯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甚至不仅如此，在土耳其觉得把它的部队撤出塞浦路斯的条件已告成熟之前，这些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

我愿安全理事会的每位成员都注意到，了解到这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在准备决议时，这是一件要牢牢记在心头的事。

切里克先生说过，当我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时我问了若干个有关的问题。事实上我确实问过，其中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土耳其方开始把它在塞浦路斯的占领部队撤出？至少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土耳其不想遵守大会第3212 (XXIX)号决议的这个事实再也不能掩盖了。

切里克先生邀请我返回塞浦路斯恢复谈判。这是一个吸引人的邀请；也是一个我全心全意都想要接受的邀请。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难道回到谈判桌上是为了接受土耳其方在谈判期间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吗？这种谈判有什么目的呢？难道目的是在接受切里克先生和土耳其代表两人如此清晰而雄辩地陈述的土耳其立场吗？——这个立场就是有两件事情是没有谈判余地的：一件是任何不在两地区基础上的解决，而另一件则是在任何多地区基础上的解决。这些是没有辩论余地的。

这就是进入谈判的过程——由两方的一方单独决定谈判的条件吗？切里克先生说——土耳其代表也曾说过——“我们不接受任何其它的保证；除了两地区制的解决之外我们不接受任何其它的解决。克莱里季斯先生，欢迎你到谈判桌上来。你接受这些条件，谈判也就完成了。”

难道这是第3212(XXIX)号决议为了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而呼吁自由谈判时所具有的精神吗？假定我也这样对切里克先生说：“来，我们在多地区的基础上谈判”；并且假如我因为在塞浦路斯驻有40,000部队而把一个多地区组成的联邦强加于塞浦路斯的话：他会接受我的邀请吗？他会因为我邀请他参加这样一种会议而送花给我吗？

我准备就在这一时刻回到谈判上去；但让切里克先生，让土耳其代表先表示他们将取消他们已经做的事情。让他们先公开说任何的谈判，任何的解决办法都放在议程上面——也就是说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可以作任何谈判，只要他们不是建基于任何由于武力而使他们能强加于人的先决条件，而是建基于自由的争辩、谈判、交换意见及合理的态度。这样我会很高兴地同他展开两族间的谈判，而他到那时也会发现我的态度是很建设性的。

还有，切里克先生说我有的一次在回答格里瓦斯将军——这位亲爱的老人不久前逝世了——时说过，在塞浦路斯谈判上我没有作出违反希族塞人民族利益的让步。是的，的确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被这位已故的老将军公开指控过，他说由于我在谈判中所作的支持和表现，我是在摧毁希族塞人的民族利益。对这一点我反驳说：“不，我没有那样做。我是在找寻一个以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为基础的解决；我是在找寻一个解决，使希腊人从而有权继续作为希腊人，并使土耳其人继续作为土耳其人。但他们将共同在这个同一的岛上生活下去，为塞浦路斯人民的福利和利益来治理塞浦路斯。”为了辩护我的立场我附加说：“这才是希腊在塞浦路斯的真正的民族利益。”

但是切里克先生却拿着那一段话，把它割裂歪曲，设法指控我在谈判时，因为

受到我作为一个希腊人的限制，而没有尽我作为谈判人员的职责。一个既成的事实，一个可用我们谈判记录予以证实的一个事实就是在那时谈判进展已很顺利，并且我们几乎就要达成协议了，就在那个时候，谈判第一次中断；当时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先生——正当谈判在进展中，并在成立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让两族各有很大程度的自治的基础上进行之中——作了若干公开的发言，首先是在他的党为他竞选所准备的备忘录中，其次是在他当选并就任后不久在土耳其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他除了联邦以外不会接受任何其它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尽管事实上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就已在塞浦路斯进行了谈判，并且朝向胜利的结束前进着、发展着，直到他，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先生，决定要改变在谈判中所走的行动方向时为止。

现在时间已不早了；我们都倾听了冗长的演说，我再说一遍，我决不再走那可憾可悲地互相指控的毫无结果的老路。假如切里克先生认为我们错了，那就让他接受一个调查委员会来令人信服地决定谁是犯错的。这样一个委员会很可能会发现双方都犯了错，并且也许还会进一步分摊双方应负的责任。

但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为过去两族的错误分摊应负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来审查那个大会通过并经安全理事会同意的决议是否已被执行的问题，是来审查是否打算加以执行的问题，并审查是否由于土耳其单方面造成的既成事实而破坏了谈判的过程。这些才是有关的问题，而对这每一个问题，土耳其代表或切里克先生都给了否定的答案：第3212(XXIX)号决议不会被执行，甚至在解决办法已经达成并经签字以后也不会被执行。迄今，就谈判过程来说，土耳其方对它正当双方交换可能导致谈判进展的建议的时刻任意采取了单方面行动，甚至连一句道歉或懊悔的话都没有说。

切里克先生说我为表示我的看法而争取安全理事会的镜头。切里克先生忘记了我从一九六四年起，直到这一次为止，从未出席过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且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我一直耐心地与登克塔什先生谈判，既没有争取安全理事会的镜

头，也没有争取任何其它的镜头，而只不过是设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作着真诚的努力，这一解决不是为了希腊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土耳其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

主席：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想在现在这么晚的时刻，我应向安全理事会作一个极其简短的解释，特别是鉴于主席所作的说明，即现在有一股意向明确的趋势，要在本周末通过一个决议。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克制自己，不要干预如此辛苦达成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我知道该决议的作者——我特别指的是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五位忠诚的成员，而他们之中只有一位是参加本理事会的——都很明白那个决议的意义。他们也明白土耳其接受这个决议的动机，并且明白我国政府接受它时所根据的条件。

联合国在通过该决议时所面对的主要议题便是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这个局势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大会明智地决定应为这个目的而举行谈判。参加过塞浦路斯谈判的人员和那些熟悉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在自从塞浦路斯独立以来的那段悲哀的历史中，所有塞浦路斯的谈判都是在有塞岛以外的武装部队存在的非常特殊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知道在许多声明中都表示过对某些基本的问题没有妥协的余地。但是谈判还是进行着。现在有人认为谈判面临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不再从一个弱者的立场来谈判了。

我请求本理事会各成员，当他们审议他们认为能在这里进行了两周的冗长而吃力的谈判和辩论中产生出来的那种决议时，不要创造一些条件，使我们同唯一同意过的内容——即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相离太远。该决议指出中心议题是：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的方法，谈判只由有关双方参加；即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想为由于内部某些政治情况而处境困难的有关一方打气撑腰的任何企图在现阶段只会使恢复谈判的过程更形困难。

这是我经过你，主席先生，要向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提出的呼吁。

主席：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对土耳其代表所说关于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话，感到惊讶。他千方百计，要使我们相信那个决议是很脆弱的，那个决议是在上届大会期间经过辛苦的努力之后方才达成的，以及最好安全理事会不要去碰它。

可是，我亲自参与了那个决议的草拟工作，而奥尔查伊大使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那个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我今天要问他那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土耳其坚持要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我知道奥尔查伊大使今天不会比那时更能回答这个问题。

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是用优美的英文起草的，一目了然非常清楚。我们都知道奥尔查伊大使的英文程度极高。

现在奥尔查伊大使还说通过这个决议只是为了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很同意他的说法。决议的通过是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要照着决议的方针来解决，不能照其它的方针来解决。而该决议的方针是很清楚的。该决议是用优美的英文起草的。奥尔查伊大使了解英文。他在投票赞成该决议时也是了解英文的。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仔细地倾听了土耳其代表的呼吁，假如我了解得正确的话，他的说法是土族塞人那方现在有了实力，因为那方在塞浦路斯有相当大的军队，并且又占据了百分之四十的共和国领土。他声称过去希腊人那一方比土耳其人那一方实力较强，因此那时不可能得到解决。假如我接受这个逻辑，那么同样的事当然可能再次发生——除非土耳其打算强迫达成解决。因为它现在在塞浦路斯有较大的实力，所以我们又面临同样的问题。必然地，从他所说的话里面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将是：让所有希腊部队和土耳其部队一同下台；让塞岛的希族人和土族人的安全交托给一个强化了了的维持和平部队；并让自由的谈判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继续下去。

为什么土耳其代表要继续在优势的实地地位来谈判塞浦路斯的问题呢？难道他想强加给塞浦路斯一个解决方法吗？假如是的话，谈判有什么用呢？必然地，正由于他说了那些话，可见象第3212(XXIX)号决议中所规定的那样，撤离一切部队是绝对必要的，进行迅速而立即的撤出，以及为找出一个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而恢复自由的谈判都是绝对必要的。

主席：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希腊大使现在问我，就象他说他在大会期间问我的那样——而我确信他问过——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该决议的条文，我的回复是因为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那个决议的所有内容。我们所不相信的地方就是在该决议内会有一些优先事项——那些与我们一道谈判这个决议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这个特殊决议是在塞浦路斯经过了十五年非常非常困难的局势以后才来到的。这十五年由于土耳其在希腊介入塞浦路斯后介入塞浦路斯而告结束。塞浦路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局势。这个局势的紧张不仅仅是由于部队的存在。而是由于把那些部队带到塞岛来的那些因素。现在塞岛的情势是还能挽救塞岛独立的最终解决已经自然而然地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着。我们也许不喜欢这样——希腊那方也许不会喜欢这样——但这是十五年不断的争吵和争斗的结果——假如这种说法合乎英文的话。因为我的英文没有那么好呀，大使先生。由于这种局势的结果，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处于一个既成事实的地位，那就是——我要非常清楚而坦白地说——不能期望我们为了那位大主教更伟大的荣耀而返回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时的局势里去。不可能退回到那个局势里去的。我们必须接受当前的局势。

我能代表我的政府庄严地声明土耳其没有意图要保留它的部队在那里。土耳其一点也不想分割塞岛。我们不想把“土耳其的”解决方法强加给塞岛。我们所要的是让塞岛的土族人民不再感到那种他们已感受了这么久的威胁。我们要安心地得到保证，即塞岛将成为它从来一直做到的——一个真正独立的岛屿，一个真

正不结盟的岛屿。我要向不结盟世界说，我们希望塞岛应是一个不结盟的岛屿，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只有希腊那方——他们称自己为“希腊政府”——能向不结盟世界提出呼吁。所有这一切都要经过谈判才会发生；没有其它方法。但我们不能接受为了要开始谈判而要我们返回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时的局势，那时一点也没有谈判的可能。我们那时面临大主教的威胁，要我们接受某些东西，不然就离开谈判桌。这就是希腊那方一直采取的立场。

我是极其坦白的。一个人必须体认到在政治的世界里有些情形是不能挽回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实验室里。在塞浦路斯发生了我希望没有发生的事情；但不幸地它们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并不是由于我们而发生的。

桑普森——巴鲁迪大使今天对他的干预是如此的重视，甚至还指出它的来源——不是土耳其人想出来的花样。那些上校的政变也不是土耳其想出来的。

我们总是回头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感到懊悔。那些都是错误，即最大过失；因此，必须予以宽恕，并让我们再从头开始“再从头开始”是，我认为，土耳其一直发现自己作为吃亏的一方所处的情势。这是一个我们将不再忍受的情势；我们不能忍受那个情势了。

现在有一个对环绕这个桌子的我们都有影响的政治问题，必须予以解决。我希望它会获得解决。我国政府的唯一希望就是这个问题会被解决，但解决将是经由谈判，而不是回到从前那个局势，使得另一方不必谈判，就象它过去十年来不举行谈判那样。假如很不幸地，这是我们所找到能使他们到谈判桌上来的唯一方法，那就太糟糕了。

主席：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这次交换看法将不会花费安理会太多的时间，不过土耳其代表发言时一开头就对什么“第3212(XXIX)号决议的优先事项”说了一些话。我只想向本理事会各成员回顾一些事实，并请他们参考大会的逐字记录，按照这个记录，决议草案提案国之一的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于表决前解释该决议时指出了该决议的优先事项。

至于奥尔查伊大使告诉我们的——即我们不能回到七月十四日的局势——没有人在要求奥尔查伊大使回到七月十四日的局势。我们唯一要求他的事情是回到一个象样的局势。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又聆听了土耳其代表向我们保证说土耳其政府没有意图要在塞浦路斯维持它的部队。该代表一直想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深信不疑。但是我很遗憾地注意到他从没说明土耳其政府打算在什么时候撤出它的部队。土耳其政府是否打算在这两个月内迅速撤出呢？还是土耳其政府打算在找到解决方法前把部队留在那儿；或象切里克先生所说的，甚至在解决方法找到后，还要等到土耳其相信塞浦路斯的一切都很圆满为止？假如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家当已更感信服了。我很遗憾，就我来说，他没有使我信服，因为他没有给出一个日期，指出何时这件吉祥的事情——把土耳其部队自共和国撤出——将会发生。

普拉雅先生（意大利）：我知道巴鲁迪大使在他发表评论时绝对不想对任何人表示无礼，而且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不过我想他不会诧异地听我说他的评论中有些地方在我看来似乎有点不合程序，我发言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出这一点。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没有选择余地，只有回答我的好朋友意大利代表了，我说好朋友因为至少在这个厅外我们是朋友。但是他怎么能说我讲的话是不合程序呢？我以为联合国的本质就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而且有一点我必须说的，就是讨论任何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个别的，而不是，就象我一再说的，陈腔滥调。我的好朋友在被任命为意大利的大使后假如他也许不怎么注意我的发言的话，也应听取一下简报。意大利是一个打从我们心里就非常亲爱的国家。当我说打从我们心里的亲爱时，并不只是从我的心里，而是从所有阿拉伯人的心里都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一些事情。我们很荣幸意大利总统，我想是今天，正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我怎么能这么漫不经心地伤害，即使是无意地，我的兄弟和好朋友呢，

可是有一点我愿请他注意的，就是我在讨论联合国的问题时，不用陈腔滥调，也不用标语口号，而用一种非正统的、个人的、个人主义的方式。

我知道为什么某些评论使他觉得刺痛。我说过就我来说，我重复一遍，我感到光荣，因为有一个地中海国家——我是在解释我说过的话，不是今天而是在许多场合，在好友普拉雅大使说话以前就说过的话——他们的人民心地善良，不想战斗和杀人，我尊敬他们。

在联合国我们的行动都是为了和平的。我们还没有达到理想国。但也许我说过，因为意大利人是如此的文明，我不认为他们是好战士。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对。我们阿拉伯人在许多方面有时是很差劲的战士。因此他应该觉得他们把生命的神圣看得比出去杀人更重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种杀人连杀谁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已被他们的政府教导成如此，那个政府说“去杀敌人”。

这就是残暴。我在这么说的时侯提到过你们比那些居住在北方的人民更文明，因为你们把文明带给了欧洲，你们，意大利人，文艺复兴在欧洲开始的。在诺曼人来到以前英国人还是野蛮人，而且在一〇六六年哈罗德被杀死了。但是在那时诺曼人已从罗马学到不少东西。罗马在那里呢？在意大利。看到了吧？还有文艺复兴，它在那里开始的呢？在英国还是在德国？德国人那时是匈奴人——阿蒂拉和他那一帮，那一套东西。我是在谈历史。所以你何必那么敏感呢？假如你要做一个战士，去加入军队好了。但你是一位外交官呀，并且我们在此都是致力于和平的。

这位先生，秘书长，他的国家曾是一个帝国，类似于一种联邦的样子。当他们失去他们的力量时，他们并不就变得文明低落了。也许他们变得更文明了。奥地利人总是很文明的。我认识他们有五十年了。他对于他们是小国，而且没有力量的事实，并不表示异议。力量意味着战争。我们，不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滥用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了麻烦。

我凭什么资格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滥用力量和不滥用力量呢？但我有我的思想权

利。而你要我穿上礼貌的紧身衣并戴上手套。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是被派为一国的大使、因而有礼节要遵守，有鸡尾酒会要参加，同时，你必须知道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但在这里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呀，看老天面上，我的好朋友。假如我刺伤了 you，我是无意的。假如你要我道歉，我就公开的道歉。也没有什么要道歉的地方；你、我之间没有什么歧异。因此，我也没有不合程序。我想是你有一点过敏了，我的好朋友。

普拉雅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不仅不希望，并且也不敢说巴鲁迪大使说话不合程序。我不知道“不合程序”是否就是离题的意思。

但是我愿以巴鲁迪大使那种友谊的表示来结束这场争吵，特别是正当他刚才提到的我国总统访问他的国家、和国王陛下的这个时际。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我只是宣布我不行使我当然享有的答辩权了。

主席：各位理事，我想这一次在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确实再没有人名了。

自从本辩论开始后的过去数周以内，各方都有了充分的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论点，他们也都这样做了。此外，安理会的所有理事都表明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联合国的其它会员国也参与了辩论。

我愿把目前的局势说明如下：二月二十日开始的关于塞浦路斯的一般性辩论到此结束。明天早上我打算召集安全理事会各位理事进行非正式协商。假如照我希望那样，由这些非正式的协商导致了一件决议草案——因为我相信大家已取得一种共同意见——那么我就在下午召集一次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因此这件事就在明天早上决定。

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不要没有必要地推迟决定，我们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解决塞浦路斯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引导到有效的谈判上去，这个谈判要在塞浦路斯两族代表之间举行，并且假如大家作出决定的话，还由我们的秘书长亲身积极地参与。这样做我们就会对减轻塞浦路斯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迅速地作出贡献。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